

一见如故

许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九江,17岁考入九江中学堂。在那里,他接触了新思潮,并加入反清革命组织“同盟会”。1911年武昌首义胜利后,他弃学从军。后又重返学堂,赴上海入中国公学,直至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。

在北京大学,他结识了李大钊、毛泽东等人,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。许德珩是五四运动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,起草了《北京学生界宣言》。1920年,为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,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。先就读于里昂大学,后入巴黎大学。

我的爷爷严济慈1901年生于浙江东阳,1923年10月赴法留学。在巴黎大学,他结识了许德珩。

论年龄,严济慈比许德珩小十岁有余,可谓忘年之交。论资历,严济慈是个单纯的留学生,毫无社会经验;而许德珩赴巴黎之前已为匡扶社稷、救国救民多有贡献,享有赫赫声名。论专业,严济慈学的是物理学,许德珩学的是社会学,学业上也无交集。然而,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挚友。

1919年,严济慈还是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,五四运动爆发,南京高师的学生走上街头,予以声援。在活动中,严济慈知道了五四运动学生领袖的名字

爷爷严济慈与许德珩

·严慧英·



▲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合影。
前排左四许德珩、左二严济慈
►1925年4月,许德珩与劳君展在巴黎结婚



和事迹,其中就有许德珩。严济慈对许德珩仰慕已久,而今有幸相识,自然是一见如故。严济慈到巴黎大学还没有开始上课,仅在补习法文口语期间就考取了一张数学文凭,在中国留学生中也是声名大噪,加之他十八九岁就在南京参加了爱国救亡活动,当然也令许德珩青睐有加。

此后,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,不仅在九三学社携手共进,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也互相关注,各有成就。许德珩不仅是著名政治活动家、革命家,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,著名社会学家。他在巴黎学的是社会学,在哲学、社会学领域多有著述,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在巴黎期间,他把法国著名

学者涂尔干的《社会学方法论》翻译成了中文。蔡元培亲自为其校阅译稿,并撰写序言,认为这是“近年来最有价值的译本”。《社会学方法论》于1925年出版,后多次重印。

严济慈是物理学家、教育家,他在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领域多有建树。一生发表了53篇科学论文和100多篇文章,出版十多本专著。其中《初中算术》《几何证题法》反复重印,在数学基础教育领域影响很广。

婚礼上的别致发言

1925年4月21日,严济慈在给未婚妻张宗英的信中汇报道:

上星期一(按:4月13日)接许君德珩与劳启荣(君展)女士结婚请帖……星期四(按:4月

16日)下午行礼于中国饭店之万花酒楼,他们强我演说,好像作为科学家的代表……

一个星期后,4月28日又写信说:

上星期六晚,许德珩夫妇来访,或作拜谢贺客之意。

从这两封信中可知,许德珩与劳君展于1925年4月16日结婚,婚礼在巴黎的中国饭店之万花酒楼举行,严济慈作为科学家的代表在婚礼上发言致贺。他从对“爱”(爱)字的分析讲起。他说,“爱”字是“受”字头,“友”字尾,中间一个“心”字。“受”字头,表示结婚是人生受用的开始;“友”字尾,表示结婚是友谊的尾声;中间这个“心”字,表示两个人爱在心中。严济慈这个理科生展示出了自己的文科才华。更确切地说,他展示的是自己对爱情的深刻理解。

许德珩与劳君展的爱情是令人艳羡的。许德珩少年成名,建功无数,自不必多说;劳君展也是著名才女,1900年出生在长沙一个富裕人家。18岁时,她考进长沙周南女中,跟女革命家蔡畅成为同学。在周南女中,劳君展担任了长沙学生联合会宣传部长,参与了毛泽东等人在湖南组织的新民

学会,还在毛泽东创办的《湘江评论》上发表文章,组织社会活动,走上街头发表演说。

1921年初,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到欧洲考察教育。在巴黎,他将同行的女学生劳君展介绍给曾经的弟子许德珩相识,并请托许德珩为将留在法国上学的劳君展补习法文。那时许德珩因为发妻早逝,自号“楚僧”,表示要像佛门弟子一样不再娶妻。但蔡校长巧妙的一个“补习”,把许德珩和劳君展拉到了一起。许、劳二人补习法文之余,还多有书信交流。一天,劳君展将许德珩来信的落款署名“楚僧”改为“楚生”。才子自然读懂了佳人的心思。相识5年后,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

作为新郎的好友,严济慈当然知道许德珩与劳君展两人的爱情传奇。婚礼上的致贺从解析“爱”字说起,再恰切不过了。严济慈还评论道:“他们两位都是爱国志士,伉俪之爱和对祖国之爱是永远不可分的。”

1990年2月8日,许先生以百岁之寿辞世。严济慈得知消息,含泪写下《深切悼念德珩同志》,从悼文中我们得知,两位老人1923年于法国巴黎“在振兴中华这一共同目标下相识并结为朋友”,而后相知相助、携手并肩,一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。(摘自4月28日《人民政协报》)

汪曾祺在北京的几个住处

·汪朗·

我父亲汪曾祺1948年来到北京,从此他的大半生跟北京结下不解之缘。他的名篇《受戒》《大淦记事》,包括那些动人的散文,他改编的《沙家浜》等经典戏剧都是在北京诞生的。

汪曾祺成了无房户

在我的记忆里,他住过七个地方。他1948年来北京后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,我没法确切认定,因为那时候还没我。比较有把握的,他住过的几个地方,一个是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时,在故宫午门旁边曾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,他写过一篇文章就叫《午门》,晚上只有他一个人站在午门前面的庭院中,看满天的星斗,有一句他很得意的话,整个世界都是凉的,只有他这一点是热的。

老头儿在东单三条和河泊厂13号的房子,是他所在单位北京市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宿舍,以后住的地方都是我妈妈单位的宿舍。有房子的叫户主,所以我们家的户主从此以后改成我妈妈的名字。

汪曾祺成了无房户,这是他的一个“短处”,也算是攥在我妈手里的一个把柄。我妈在新华社是管对外报道的,有一次她想写一篇关于老北京人遛鸟的稿件,给国外休闲刊物供稿,她就让老头儿给介绍。老头儿说起来头头是道,我妈说行,你给我写一篇东西吧。老头儿就犯狂了,脖子一梗,“你们这

新闻稿有什么可写的?不写。”我妈大叫一声:“汪曾祺,你别狂,你现在都住在我们单位的房子,自己房无一间,瓦无一垄,你有什么可狂的。”老头儿于是不说话了,过几天就把这个稿子乖乖交出来了。

在河泊厂写自己想写的东西

河泊厂时期,我已经进了幼儿园,而且是全托。他那时候心情也比较好,接送我去幼儿园,接送肯定是奉命,虽然他是户主,地位还是在我妈之后,他那时候还有时间陪我玩儿。我们住的地方离天坛公园很近,我印象里经常去天坛公园,有时候还晚上去,初秋晚上带我们去草丛里躺一躺,听听蛐蛐儿叫。

当时我们家住处前面有一个空场子,不大。那时候经常有骆驼从城外拉煤,还有驴队。驴队是运水果的,骆驼是拉煤的。经常有骆驼卸完货就在那卧着。他从幼儿园带我回家,没进家门就先去看骆驼,骆驼在那反刍倒嚼,还看驴打滚。驴打滚挺好玩的,半天翻不过去。后来他有一组写老家的小说《故里杂记》,其中有一篇《榆树》,里面有个倭奶奶,整天给人纳鞋底,唯一乐趣就是每天看小孩牵的驴在他们



1948年,汪曾祺与爱人施松卿家空场打滚,一下翻不过去,两下翻不过去,第三下翻过去,驴很舒坦,倭奶奶也松了一口气。我怀疑他是因为看了家门口的驴打滚才写了这一段。

在河泊厂的时候,老头儿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小小的高潮,他开始写自己想写的东西。小说没写,但是写过几篇散文,像《下水道和孩子》《冬天的树》《星期天》,还有散文诗《早春》,其中有几篇就是住在河泊厂的时候,他带我从小从幼儿园回家路上的感受,或是宿舍周边的环境变化。

《冬天的树》里有一篇叫《公共汽车》,是写他带着我去幼儿园的过程中的见闻,那时候我小,老喜欢看公共汽车司机开车,觉得挺好玩的,每次都要挤到最前面去看司机怎么开车,他每次都哄着说“借光借光,我们孩子想看开车”。他在文章里面还写,我儿子长大想开公共汽车,我想了想表示同意,最后一



1996年,虎坊桥书房中与家人句又是:我儿子长大想开公共汽车,我没意见。所以他从小就没给我们灌输过成名成家的思想。后来过了那段,我觉得公共汽车司机已经不新鲜,但也没有想过以后当什么。所以我和我妹妹,小学时写作文一碰到我的理想之类的题目就头疼,不知道写什么,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长大要当作家,要当科学家什么的。

《随遇而安》是他的心里话

老头儿去张家口大概是1958年底,那时候我们已经搬了两次家,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家在文昌胡同8号。

那次探亲我印象挺深,好像他对下放劳动挺兴奋的。比如刨粪,他干过这个活,感觉很新鲜。冬天领着一些人去张家口市区刨粪,溅了一身冰碴子、粪水。我妈听了之后就皱眉头说不臭吗?他说都冻上了,没味

儿,冰碴儿溅到身上,一抖都下去了。这个场景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,他没有把劳动当成很苦的事,他写那段经历的文章是《随遇而安》,那是他的心里话。

第二次探亲,隔了一年,我们家还住在那里。这个住处跟他的创作基本没有关系,但是他在哪儿展示了一次厨艺,砸了锅。他第二次回来可能是夏末秋初,北京那时夏天的尾巴有一段鲜菜很少,叶子菜基本没有了,只有老黄瓜、拉秧的西红柿、茄子、冬瓜什么的,就几样菜,再晚一点大白菜上来又好一点。他闲着没事,就拿茄子剁馅包了一顿饺子。以前我们家从来没吃过茄子馅。吃过之后我们觉得味道还行,我妈是一个热心肠,说你再做一次吧,让我们部门的同事来尝尝。老头儿于是又忙活一番,又剁馅又擀皮,结果第二次彻底砸锅,饺子下锅以后全都破皮了,变成一锅片汤,皮是皮,馅儿是馅儿,没几个囫圇个的。后来他总结经验,一个是茄子馅水分没挤干,还有就是面的质量太次。当时是困难时期,供应的面有一种是黑面,麸子含量特别高,黏性不足,擀出的饺子皮周边有一圈小裂口,根本捏不住,结果下锅都成片汤了。所以老头儿的厨艺也不是一开始就很高明,也是慢慢地锻炼,慢慢地提高。(摘自《新文学史料》2022年第2期)